

# “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与可行性路径 ——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探讨

张晒

(东南大学 公共管理系, 南京 210096)

**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政府选择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推行“绿色发展”是修复和维护“空间正义”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根据“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绿色发展”必须要在“空间正义”的框架内及其主导下展开——守住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界限,即根据各事物的固有属性及其意义划清其空间界限并守住其界限;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与救助作用,即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来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改善生产方式和提高发展水平,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处于贫困状态尤其是濒临“绝望交易”的民众提高生活能力和改善生活水平;引导大众的“绿色发展”行为,即通过选择性激励来引导民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关键词:** 人与自然; 绿色发展; 空间正义; 空间界限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7)01-0028-07

## 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政治主题<sup>[1]</sup>,它“代表了未来全球发展方向,也成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焦点”<sup>[2]</sup>。所谓“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和生态发展理念。”<sup>[3]143-146</sup>客观地讲,中国对“绿色发展”的认识和行动要明显滞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重视“绿色发展”了,而中国则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而在发展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才开始引入“绿色发展”的理念并逐步予以重视的。2010年5月8日,李克强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主旨演讲中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被首次单列为重要篇章;在201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绿色发展”首次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被纳入并系统化。至此,“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最高层次的发展战略。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选择“绿色发展”模式应该说既是必然的——中国初级工业化的“东北道路”已经走到尽头,而高级工业化的“深圳道路”也已落入工业经济的“结构陷阱”<sup>[4]</sup>,也是毋庸置疑的——“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sup>[5]</sup>,但是,要真正地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并将“绿色发展”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始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源于人们对“绿色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比较粗浅甚至模糊的状态,更源于人们对“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尚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和达成广泛的共识。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而许多困难长期无法克服,与人们在“绿色发展”中存在的许多误区有很大关系。正是这些误区的存在,才使中国的“绿色发展”乃至世界的“绿色发展”得不到真正的推进<sup>[6]50-54</sup>。那么,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绿色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绿色发展”又该如何推进?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亟待解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从理论上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合理解答,才能破除“绿色发展”的观念障碍和行动障碍,才能使“绿色发展”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口号变成现实。

收稿日期: 2016-05-06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资助项目“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扩散机制研究”(2242016S3004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与动态推进研究”(15CKS014)

作者简介: 张晒(1983—),男,政治学博士,讲师,E-mail:shaizhang09@163.com

## 二、既有文献综述

近十年来,伴随着国内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社会现实以及政府日益对“绿色发展”予以重视的政治现实,国内学术界不同学科(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法学、哲学、环境科学等)的研究者也对“绿色发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既有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尤其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内容给予了重点关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王玉庆(2013)看来,绿色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要绿色化,二是绿色要创造发展<sup>[7]</sup>。蒋南平、向仁康(2013)则认为:“绿色发展的实质及内涵,应该定义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害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基础上。”<sup>[6]50-54</sup>李佐军(2012)指出,“绿色发展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是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发展方式。”<sup>[8]</sup>而郇庆治(2012)进一步指出,绿色发展至少可以从3个层次来理解和界定:一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它首要关注的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活动及其后果的生态的可持续性;二是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它首要关注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三是环境/资源可维持的绿色增长,它首要关注的是使依赖或可掌控的自然生态能够支撑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别是GDP增长。而且,在对“绿色发展”的“3个层次”的理解和界定中,蕴含着不同国家和社会团体对“绿色发展”要求的依次递减率,即第一层次高于第二层次,第二层次高于第三层次。而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绿色发展是在第三个层级上被政治议题化和政策化的<sup>[9]</sup>。应该说,郇庆治对“绿色发展”的认识还是相当全面的。还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阐述了“绿色发展”的内涵。比如,王玲玲、张艳国(2012)基于系统论的思维对“绿色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绿色发展应该是包括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等4个系统的统一与均衡发展,其中,绿色环境发展是绿色发展的自然前提,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精神资源<sup>[3]143-146</sup>。类似地,杨建林(2013)也认为,绿色发展应该包括4个方面的要点:一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把解决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四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手段和目的<sup>[10]</sup>。

在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内容进行研究之外,一些研究者也对推行“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探讨。在张永生(2012)看来,绿色发展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最全面的变革,它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全方位的改变<sup>[11]</sup>。秦书生、杨硕(2015)认为,绿色发展是应对环境危机、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的必要选择<sup>[12]</sup>。竺效、丁霖(2016)也认为,绿色发展理念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问题的思想智慧在当代的突出体现,是当代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观<sup>[13]</sup>。邬晓燕(2014)、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同样认为,“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道路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sup>[14]97-101</sup>“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sup>[15]</sup>赵峥(2016)进一步指出,绿色发展要以经济、社会、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应该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得,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和发展性<sup>[16]</sup>。而张治忠(2014)则从价值观方面阐述了“绿色发展”的逻辑,他指出,当代绿色发展观要体现3个方面的伦理维度:绿色发展观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解的视角以“人类的存在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绿色发展观必须在演进过程中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个理论核心的“同一式”发展的逻辑进程;绿色发展观必须基于全社会对节约观达成一致共识从而形成一种节约型的、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sup>[17]</sup>。他还指出,“绿色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更是一种具有终极价值功能的价值诉求。”<sup>[18]</sup>由此可见,研究者在探讨为何选择“绿色发展”即推行“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时,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延伸和深化”,以及“应对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冲突的不二选择”。客观地来讲,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深度和启发性不够。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绿色发展”的路径上——这也是“绿色发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赵建军(2013)认为,“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必须以新理念催生新制度,以新制度保障新举措,以新举措促进新变化,以新变化带动新发展。”<sup>[19]</sup>他还指出:“‘绿色发展’的难点不在于人与自然的对立,而在资本与人、资本与自然的对立。但资本背后其实是积累起来的剩余抽象劳动,因此,所谓‘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自我扬弃。这意味着:只有扬弃资本的劳动方式才能实现‘绿色发展’。”<sup>[20]</sup>李娟(2012)则从“人心”层面

出发,提出了“绿色发展”的路径,认为“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对自然进行理性认识,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上的再思考”<sup>[21]</sup>。白瑞、秦书生(2012)从“技术”层面着眼提出了“绿色发展”的路径,认为绿色技术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发展必须强调环境保护,实施绿色战略,选用绿色技术,生产绿色产品,形成绿色产业<sup>[22]</sup>。邬晓燕(2014)从“体系建设”层面切入探讨“绿色发展”的路径,认为“实现绿色发展,其根本要求是把可持续性和绿色思维贯彻到经济和发展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的始终”,并从制度、文化、政策和伦理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即“加强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和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加强绿色发展的政策变革与制度建设、加强绿色发展的公共政策伦理建设、加强绿色发展的消费文化建设”<sup>[1497-101]</sup>。邓远建、张陈蕊、袁浩(2012)则从“生态资本”的视角切入来探讨“绿色发展”的路径,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sup>[23]</sup>。蔺雪春(2013)从“生态城市建设”的角度切入探讨“绿色发展”路径,提出生态城市是当代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推进“绿色发展”必须把生态城市建设作为主抓手<sup>[24]</sup>。吕薇(2016)则清醒地认识到,绿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它涉及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等各方面,需要融合法律、行政、经济、社会治理等手段来协调推进。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营造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转变传统的环境保护模式<sup>[25]</sup>。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获知,国内学术界在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内容做出了比较到位的概括和把握,这为政府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这表现在:其一,既有的研究着重从一般理论上阐释“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基本内容,而对“绿色发展”在当前语境下的特定含义及其重要意义缺乏足够深刻的研究;其二,既有研究在总结选择“绿色发展”的原因时着重停留在经济社会的表层上,而对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步入后现代社会而其自身却又处于现代和后现代交叠且面临转型和变革的复杂背景下选择“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缺乏深刻的研究;其三,既有研究在探讨“绿色发展”的路径时着重于事实层面,而缺乏从应然层面和价值层面对“绿色发展”的路径进行更独到和更深刻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引入“空间正义”的理论视角,对“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与可行性路径进行一个相对有效的研究。

### 三、分析框架与思路

但正式而成熟的“空间正义”概念则是当代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危机,一些思想家开始以“空间”为突破口进行政治经济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城市危机,解释城市空间问题,进而论证并提出了“空间正义”思想<sup>[26]</sup>。皮里(Pirie)曾在《论空间正义》中做过比较经典的解释:如果把空间看作是绝对的,是事物发生和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那么,“空间正义”就是“空间中的社会正义”的简单缩写<sup>[27]</sup>。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于“空间正义”也持有与西方思想家相似甚至相同的观点。比如,曹现强等(2011)认为:“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维度。”<sup>[28]</sup>任平(2006)认为,所谓“空间正义”,就是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的社会正义<sup>[29]</sup>。国内外学者均认为“空间正义”意味着一种“空间”维度上或“空间”意义上的正义——而这个“空间”不仅是指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空间,也应该包括受社会关系影响的自然空间。换言之,“空间”是指人类及其周围事物所依托的整个世界。

习近平曾经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sup>[30]</sup>这讲的既是空间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讲的是各个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进而也是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空间的生产和对空间的分配关系;并且,在这一关系中,人及其所进行的社会生产是决定性要素。如果这个关系能够得到维护,也就意味着实现了一种“空间正义”;反之,如果这个关系得不到维护,也就意味着打破了“空间正义”的格局。而要使这个关系得到根本维护,就需要推行“绿色发展”,让空间中的各个要素“安其位,尽其力,取所需”。这样看来,“绿色发展”与“空间正义”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具体而言,“绿色发展”是“空间正义”的依托和表征,而“空间正义”则是“绿色发展”的归属和实质。事实上,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个问题,如冯志鹏就提出“要以时间正义和空间正义为基础来建构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伦理”<sup>[31]73-75</sup>,但他的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总之,从“空间正义”的理论视角来研究“绿色发展”的逻辑及路径是可行的。

任何一个事物都拥有内在规定性即内在的必然逻辑,“绿色发展”亦不例外。“绿色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

辑决定了“绿色发展”的生长路径，“绿色发展”的生长路径也体现着“绿色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不过，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个事物，其内在必然逻辑也会不一样，即“逻辑会跟着视角”走。进而言之，从“空间正义”的视角来审视“绿色发展”也就意味着其内在必然逻辑是按照“空间正义”展开的，相应地，其路径也是按照“空间正义”生长的（可以表示为，视角→内在必然逻辑→生长路径）。因此，当我们从“空间正义”的视角对“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审视之后，“绿色发展”的路径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就可以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来说，分为三步：首先，从“空间正义”的视角对“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进行阐释；其次，基于“空间正义”的“绿色发展”的逻辑对“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进行论述；再次，对整个研究进行一个总结，即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

#### 四、“绿色发展”是“空间正义”的必然选择

我们（包括人类及其周围的一切事物）处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但我们所处的空间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空间的意义源自构成空间的事物。换言之，是空间中的事物赋予了空间以意义，即建构了空间的意义。当空间中的事物不存在了，空间的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地消逝了。空间中的事物对空间意义的建构取决于空间中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当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发生变化时，空间的意义就会跟着发生变化。空间中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如洪水、地震、海啸等，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中，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对空间中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影响是主要的，因而成为空间意义的主要生成力量；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实践活动对空间中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影响是主要的。因此，在当下，人类所从事的任何改变空间中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实践活动都会深刻地影响着空间的意义。

当（处于离散状态的）空间的意义按照一定的性质和方向进一步集聚，就表现为“空间正义”状态。如同空间的意义一样，“空间正义”也受到自然力量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双重影响，而且，与空间的意义比较起来，“空间正义”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反应更为敏感。在很大程度上，“空间是由社会过程建构的”<sup>[32]</sup>，即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建构的。一旦人类的实践活动影响到了空间的意义，“空间正义”就会立刻跟着发生改变。不过，虽然人类的实践活动会深刻地影响着空间正义，但是人类并不能作为衡量空间是否正义的唯一尺度；除了人类之外，衡量空间是否正义的尺度还包括分布在空间中的各种事物，尤其是那些拥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换言之，当人类作为空间中万事万物的代表而对空间是否正义作出判定时，一定要站在空间中所有事物的立场上，而不能偏向于自己或者空间中的任何一部分事物。换言之，空间是否正义并不由人类说了算，而是应该由空间中的所有事物说了算——人类只不过是“空间正义”的代言人罢了。

既然人类并不是衡量空间是否正义的唯一尺度，那么，人类的任何一个实践活动就可能会对空间正义产生负面或消极影响。换言之，不仅人类所开展的对自身来说属于不正义的活动是对空间正义的破坏，比如，人类的侵略战争、以牺牲他人（物）利益为代价的发展、对他人（物）艰难处境的熟视无睹和冷漠无情，等等；而且，就是那些人类所开展的对人类自身来说属于正义的活动也可能是对空间正义的破坏，比如，向太空进军、向深海进军、人类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而修建横贯海陆的铁路或隧道——它们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具有正义属性的便利和发展，但却改变了空间中其他事物的格局，尤其是破坏了空间中部分生物长期所依赖的生存环境，严重地还会使一些生物走向灭绝——近年来愈演愈烈。因此，人类不以空间中所有事物为立场的实践活动是会破坏空间正义的。

中国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发生在中国这个空间范围内的任何活动都会对空间正义产生影响。同理，这个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及民众的实践活动既为促进空间正义做出了贡献，如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空间正义，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资源的过度消耗，虽然转化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物质财富，但却剥夺了除当前中国民众以外的其他人和物（主要是指动物和植物）对资源的使用权，影响了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不正义的；环境的严重污染不仅伤及到中国民众自身，还给在中国这个空间中的其他事物尤其是动物和植物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显然也是不正义的。中国若是不能在发展中遏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对空间正义的破坏就会越走越远。而且，即使中国拥有强烈的理由——认为自己的一切发展都是本着对本国人民负责和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

因而是正义的,那也不能改变破坏“空间正义”的既定事实,也不能功过相抵。

总之,“空间正义”是由空间中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共同决定和创造的。空间中的任何事物包括对其他事物拥有认识能力、控制能力和改造能力的人类都无权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无视以至于破坏其他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而在人类以往的实践活动中,人类对“空间正义”的破坏实在是过于严重了。人类自以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成绩,比如,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占据了正义的制高点;殊不知,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变其他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为前提的,而这种改变就是对“空间正义”的空前破坏。退一步来看,如果除人类以外的其他事物也能够像人类一样拥有语言、思维和行动能力,那么,它们就会向人类发出抗议,就会把人类送向“空间正义”的审判台上。只不过,在这场人类与其他事物处于力量绝对悬殊的争夺中,人类侥幸胜利了。事实上,人类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因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地理环境、生态环境进行改变而引发的地震、海啸、山洪、传染性疾病,等等,就一次又一次地侵袭人类。这正是人类破坏“空间正义”所换来的苦果。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31]</sup>马克思的这番话告诫我们,人类的发展不能仅仅以自身的利益和条件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而是应该以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存在条件即空间中的所有人和事物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也就是说,作为空间的构成部分的人类的存续发展,必须要把促进和维护“空间正义”作为根本标准。进一步来说,我们既要“从自然空间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与其他动物、其他生命形式乃至整个自然界的联系”,也要“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去把握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发展利益获得和发展代价与风险分担上的责任和义务问题”<sup>[31]73-75</sup>。而这正是“绿色发展”问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维护“空间正义”和推进“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一体的,即维护“空间正义”必然要求推进“绿色发展”,而推进“绿色发展”也必然会导向“空间正义”。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成员,中国适时地选择了“绿色发展”战略。这既是中国摆脱目前发展困境的正确选择,更是中国促进“空间正义”的明智之举。一言以蔽之,从“空间正义”的要求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就在于此。

### 五、“空间正义”引导下的“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是什么呢?“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实质上预设了“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当中。“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是维护“空间正义”,这也就意味着,“绿色发展”的可行性路径也必须要在“空间正义”的框架内和引导下展开。进而言之,“绿色发展”的推进之路也就是“空间正义”的修复和维护之路。

如前所述,空间是由不同的事物构成的。“空间正义”实质上就是空间中的各个事物的“占位合理,分布得当”。因此,“空间正义”引导下的“绿色发展”就是在空间存续中要始终维护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维系各事物之间的均衡格局。此外,由于人类在空间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事物处于从属甚至是有时被人类奴役和宰割的地位。因此,人类能否维系空间事物既有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将直接决定空间是否正义。这也就是说,“绿色发展”最关键的还是人类自身。空间中的既有秩序相当于人类与其他事物结成的契约。而只有人类履行了契约,其他的事物才会占据在属于它们的位置上,这样才能使整个空间维持正义秩序。具体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从3个方面进行努力。

守住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界限。人类必须要维护空间中各个事物的既有秩序,根据各事物的固有属性及其意义划清其在空间中的界限并守住其界限,而绝不能越界打破空间既有的平衡格局。即使人类为了追求自己绝不能放弃的利益(即维护人类的存续发展的基础性利益)而开展实践活动,也必须要以尽可能少地打破空间中既有事物构成的平衡格局为前提,而不能肆意地、任性地、不计后果地改变乃至破坏某些事物尤其是拥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在任何时候,人类都要守住这个底线——哪怕是停止发展的脚步。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适用自然规律。”<sup>[34]</sup>尽管我们人类凭借自身特有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空间中万事万物的命运,但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和运用万事万物,要让它们按照其在空间中应有的意义去合理地存在以及按照其自身的属性发生变化。

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与救助作用。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这不仅表现在(物质和精神)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少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少部分个人手中,更表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民众。而位于世界发展水平末端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民众显然是推行“绿色发展”的阻力和障碍——这是因为,推行“绿色发展”就要求他们放弃至少是改变目前维持基本生存和生活的生产方式,而这样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革命”,这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抗拒。换言之,如果世界的发展更均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更均衡一些、人的发展更均衡一些,那么,位于发展水平末端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处于贫困或艰难状态的民众就会相对少一些,相应地,推行“绿色发展”的障碍和阻力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减弱一些。因此,对于当今世界存在的阻扰“绿色发展”的发展失衡问题,必须要发挥再分配的调节和救助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对)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要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帮助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改善生产方式,提高发展水平,逐步缩小发达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和政府都要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那些处于贫困状态和困难情形的民众,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杜绝发生“绝望交易”<sup>[35]</sup>的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当前中国存在的发展失衡和贫富悬殊的现实来看,中国政府要更加注重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引导大众的“绿色发展”行为。一般来说,代表国家的政府往往因能获得相对全面的信息以及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而能够成为先知先觉者和率先行动者,而民众因受到狭隘私利的驱使和左右(通常表现为“搭便车”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受到不对称信息传播的干扰而经常会成为后知后觉者(甚至不知不觉者)和行动滞后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行动与民众的行动就会出现不一致和相抵触的情形,即政府并不能引导民众按照其要求统一行动。对于民众在“绿色发展”上的消极怠慢和滞后行动,政府除了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以扩充民众的信息源而进一步提高民众对“绿色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之外,还需要采取“选择性激励”来规避和引导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选择性激励是指“根据个人在生产集体物品时的贡献大小,有选择地提供个人的激励”<sup>[36]</sup>,它分为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sup>[37]</sup>。正面激励是对贡献者进行奖赏,负面激励是对非贡献者进行惩罚。这也就是说,要以正面激励来奖励民众中的“绿色发展”行动者,要以负面激励来惩罚民众中的“绿色发展”阻挠者,有效地引导民众践行“绿色发展”。总之,民众是行动的最重要的主体,推进“绿色发展”维护“空间正义”,关键还是依靠民众思维的转变和行动的向善。

## 六、基本结论

通过前面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从“空间正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空间正义”的基本格局,即破坏了空间中各类事物基于其属性和意义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使空间秩序发生了错位乃至颠覆性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选择和推行了“绿色发展”的理念——这正是修复和维护“空间正义”的必然选择,而这也进一步预设了“绿色发展”必须要在“空间正义”的框架内和引导下展开。进一步来说,作为对“空间正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必须要守住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界限——这是基本的底线;同时,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还必须要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与救助作用,并要引导大众的“绿色发展”行为。有且只有这样,中国的“绿色发展”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 参考文献:

- [1] 郇庆治. 发展的“绿化”: 中国环境政治的时代主题[J]. 南风窗, 2012(2): 57-59.
- [2] 张梅. 绿色发展: 全球态势与中国的出路[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5): 93-102.
- [3] 王玲玲, 张艳国. “绿色发展”内涵探微[J]. 社会主义研究, 2012(5): 143-146.
- [4] 季铸. “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DB/OL]. [2010-07-02]. <http://www.snxw.com/zhuantilanmu/lshj/jpy/201007/1431073.html>.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123.
- [6] 蒋南平, 向仁康. 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J]. 当代经济研究, 2013(2): 50-54.
- [7] 王玉庆. 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1): 70-72.



- [8] 李佐军. 中国绿色转型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1.
- [9] 邹庆治. 国家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J]. 江西社会科学, 2012(8): 5-11.
- [10] 杨建林. 绿色发展实施战略与科学发展观[J]. 思想战线, 2013, 39(2): 153-154.
- [11] 杨良敏, 姜薇. 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N]. 中国发展观察, 2012(8): 44-48.
- [12] 秦书生, 杨硕. 习近平的绿色发展思想探析[J]. 理论学刊, 2015(6): 4-11.
- [13] 竺效, 丁霖. 绿色发展理念与环境立法创新[J].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 2016(2): 179-192.
- [14] 郭晓燕. 绿色发展及其实践路径[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97-101.
- [15] 胡鞍钢, 周绍杰. 绿色发展: 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J]. 2014, 24(1): 14-20.
- [16] 赵峥. 城市绿色发展: 内涵检视及战略选择[J]. 中国发展观察, 2016(3): 36-40.
- [17] 张治忠. 论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的伦理意蕴[J]. 伦理学研究, 2014(4): 123-127.
- [18] 张治忠. 论基于绿色发展的现代节约美德[J]. 伦理学研究, 2015(4): 116-120.
- [19] 赵建军. 中国实施“绿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2(1): 1-5.
- [20] 赵建军. 人与自然的和解: “绿色发展”的价值观审视[J]. 哲学研究, 2012(9): 28-31.
- [21] 李娟. 国家竞争力视角下中国绿色发展研究[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1): 122-126.
- [22] 白瑞, 秦书生. 论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J]. 理论月刊, 2012(7): 106-109.
- [23] 邓远建, 张陈蕊, 袁浩.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 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4): 19-24.
- [24] 蔺雪春. 通往生态文明之路: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与绿色发展[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3(2): 32-36.
- [25] 吕薇. 营造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J]. 经济纵横, 2016(2): 4-8.
- [26] 李秀玲. 空间正义理论的基础与建构——试析爱德华·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3): 75-81.
- [27] PIRIE G H. On spatial justi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83, A(15): 471.
- [28] 曹现强, 张福磊. 空间正义: 形成、内涵及意义[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 18(4): 1-5.
- [29] 任平. 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 城市发展研究, 2006, 13(5): 1-4.
- [30]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DB/OL]. (2013-11-16).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6.html>.
- [31] 冯鹏志. 时间正义与空间正义: 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从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看可持续发展伦理层面的重建[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20(1): 73-75.
- [32] 李春敏.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J]. 哲学动态, 2012(4): 34-40.
- [3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70-471.
- [3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83-384.
- [35] 沃尔泽.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和平等一辩[M]. 褚松燕,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138.
- [36] 戈登·塔洛克. 寻租[M]. 李政军, 译.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58.
- [37]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42.

## The Deep Logic and Feasible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 —An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Justice

ZHANG Shai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hose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pace justice”, which is the deep logic of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deep logic of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must be opened in the framework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pace justice”—keep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things in space, which is drawing the boundaries of things in space according to their inherent nature and meaning and holding their boundaries; developing the role of redistribution in regulation and rescue, which is helping backward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and improve their development level through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helping the people in poor especially on the verge of “desperate deal”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through the tax and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guiding the masses’ activ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is guiding the public to carry ou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selective incentives.

**Key words:** man and nature; green development; space justice; the delimitation of space

[责任编辑: 孟青]